

## 香港史家群像與史學新里程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香港一向予人的印象，是繁華的商業社會和金融中心，在今日則是遊客的購物天堂，甚至有人懷疑香港究竟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但大家又承認，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地，是海內外學者往來聚會之所，資訊發達，搜求不同地區或語文的出版物亦較便利，具備自由開放的條件，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下，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好地方。

那麼，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學術表現是否可觀呢？你認同本地學者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嗎？百多年來，多少知名學者活躍於香港史學界，他們的著作和貢獻，可曾引起社會大眾注意？以下試舉述其大端，或許可以令你改變看法。

### 一、早期香港史學享譽亞洲

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出版的中文報刊，既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亦深遠。《遐邇貫珍》是本地第一份中文雜誌，又是鴉片戰爭後華人社會最早出現的期刊，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同類型報刊都比它遲。該刊且保留了不少珍貴史料，例如：率先報導太平天國事件，記載日本、琉球開國前後的政治社會狀況，刊登中國人最早的日本見聞；當時日本政府和學者視之為重要文獻，抄本保留至今。

著名文士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開中國政論報刊先河；他在聖保羅書院畢業生協助下編撰《普法戰紀》，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本世界史著作。中國學者在英國大學演講，應邀到日本訪問，王韜實為第一人，而這些都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王韜的著作，影響還及於東南亞。

### 二、著名史家任教香港大學

二十世紀前期，香港大學聘賴際熙、區大典講授中國史學和經學，後來成立中文學院及馮平山圖書館，國學研究續有進展。進出國門的學者，不少都曾到港大訪問，擔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多年的陳君葆，在日記中保留了豐富材料。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全集》七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從1932年寫到1982年，足足半個世紀，在眾多中國文人學者所寫日記當中，其起迄之長、篇幅之巨是屈指可數的。

著名學者許地山、陳寅恪，曾在港大任教。許地山是作家，擅長道教史，後來對香港史地產生了興趣，成為這方面的拓荒者。陳寅恪精於隋唐史，其代表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都是在香港完成的。中日戰爭爆發之初，香港尚算安定，無意中為一代宗師提供鑽研學問的天地，是學術上的一種緣份。

### 三、「民國史學南移」帶來盛況

1949年前後，由於政權轉移，部分學者離開中國內地，或南下香港，或東渡臺灣，從而使港、臺兩地的史學隊伍驟見盛大。來港學者之中，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羅香林任教港大，太平天國史權威簡又文、中國近代史專家左舜生等，在港研究不輟，學界因而有「民國史學南移」之說（李金強首倡）。

錢穆早年的代表作是《國史大綱》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來港後勤於撰述，出版《中國思想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秦漢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多種，晚年移居臺灣。錢穆史學的影響，遍及港、臺和海外，近年重新引起中國內地學者注意，其著作流通頗廣。

羅香林前期專注隋唐五代史，又以孫中山研究著稱，來港後續於宋、元、明史有所發揮，並涉獵中西交通及基督教史。而對本地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是《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兩書。羅氏從港大退休後，任教於珠海書院。中國學者致力於香港前代史及近代史研究，羅氏為第一人。

#### 四、香港中文大學名師雲集

除新亞書院、珠海書院外，1950年前後，還有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浸會學院等私立大專院校湧現，使本地高等教育趨於蓬勃。各校均不乏名師坐鎮，為有志進修的青年提供了較多機會。可惜物換星移，這時期學者的著作，不少都湮沒無聞，為人所忽略。例如衛挺生認為徐福就是古代日本開國的神武天皇，衛聚賢強調中國人發現美洲，二人之說曾經引起爭論，在今日仍有再探討的必要。中國人提倡歷史統計學，梁啟超開其端，衛聚賢繼其緒，至今猶待發揚光大。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華文史學得以更上一層樓。早期在該校任教的著名中國學者，史學史、學術史有牟潤孫，歷史地理、制度史有嚴耕望，社會經濟史有全漢昇。另有王德昭講授史學方法、中西交通史及西洋史，又從世界史看中國史；陳荊和講授東南亞史及日本史，其代表作《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為學界所推崇，並整理《大越史略》、《大越史記全書》等重要史料，將中國史視野擴寬至東亞史。上述學者均為一時之選，其盛況或可媲美民國時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

#### 五、香港史學研究面向轉型

1970年代以降，老一輩學者相繼退休，或逝世、或離港，史學教研崗位上，新一代學者輩出，當中雖有不少來自外地，但整體上呈現了本地化的傾向。香港史研究興起，亦因應了時代需求。以香港為主體的史學研究，至此遂告形成。前此來自中國內地和臺灣的學者，或多或少總有寓居心態，他們培養出來的學者，則多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

學術上的自由和地理上的方便，使香港史學擁有本身的風格，中西史學理論及研究方法兼收並蓄，呈現了本土化與多元化、本國性與國際性「既矛盾又統一」的特色。當代學人強調「科際整合」，實與傳統中國學問文史哲互通暗合。香港學界現正致力於為國學大師饒宗頤籌辦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重振國學研究應該是本地學者的任務之一。香港史學的新理念，相信是在以中國為主體的前提下，運用此時此地的言論空間，結合東西方文化傳統，探求本地化與國際化兼容的道路，從而為中國以至世界作出貢獻。

#### 六、香港浸會大學的史學傳承

繼港大、中大之後，香港浸會大學成為第三個開辦歷史本科及高級學位課程的公立機構。該校由章群、劉家駒、司馬長風等學者奠下根基，上承錢穆、羅香林之風，弘揚王德昭、陳荊和之學，年前更成立近代史研究中心，以促進史學研究為職志，於中國近現代史、香港史、亞太史、女性史、基督教史及中外關係均有措意。

此外，嶺南大學亦於近年創立歷史系，樹仁學院歷史系正在籌辦學位課程，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公開大學、教育學院、珠海書院等校，均有多位歷史學者擔任教職，分庭抗禮，可見史學教研工作已趨普及。學院史學之外，民間史學亦見萌芽。

不同院校的學者加強合作，始可為史學開創新局面。學術團體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檔案學會均有活動。以中學教師為主力的香港歷史學會、

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香港中史教師會，都發揮了一定功能。二十一世紀香港史學界的首要課題，相信是建構共同的新理念。

【作者簡介】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

## 【史學傳承】

### 新亞研究所師友雜記

李金強

錢穆（1895-1900）先生在本港創辦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早於中學時已有知聞。及至回台升學，就讀於師範大學（師大），時中國文化史一科，業師朱際鎰規定閱讀錢氏之《中國文化史導論》及《文化學大義》二書，並撰書評。對錢氏之學，由是有所認識而心領神會。1967年錢氏移居台北，講學中國文化大學，並出版《朱子新學案》一書，繼而發表《朱子學提綱》，轟動士林。遂得閱讀《提綱》一書，讀後猶如對中國學術思發展，獲一全面性鳥瞰的認識，留下深刻印象，故已有畢業後回港投考研究所之志。

回港後，得悉師大學長歐陽鎰豪於1971年先行考入研究所，繼而同班雷家驥亦於1972年考入，時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均設於農圃道，而新亞中學則尚未開辦。其時余於中學任教，課餘即至農圃道，與鎰豪、家驥共聚，並因而得識全師漢昇之助理李龍華，研究所1970年入學的廖伯源，及家驥同屆之梁國豪與劉楚華四位，並認識大學部歷史系四年級生陳懿行及何漢威二位。

龍華及漢威先後至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攻讀博士，余亦於稍後獲浸會停薪留職，並資助前赴澳大深造，得以重逢。時龍華已畢業，任職澳大遠東語文圖書館，而漢威則仍在學，時常往還。漢威記憶力驚人，中、西史學造詣至深，與其相交，獲益良多，其後畢業至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任職至今。

而伯源及楚華二位則至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攻讀博士，國豪則至京都大學深造，家驥返回台北，至中國文化大學攻讀博士，今則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伯源亦於法國畢業後，一度回所任教，現則任職於史語所。而楚華亦稍後來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成為同事。

余於1973年為研究所錄取入史學組，同屆尚有陳懿行及戴桂冠兩位，而與同年入學的翟志成交往較多，志成為中山大學之紅衛兵，文筆犀利，深得所中師長之喜愛，其後至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隨杜維明攻讀博士學位。1985年與他在國立星加坡大學重遇，志成任職於該校之東亞哲學研究所，該所為星加坡政府鼓吹儒學之學術機關，今已結束。日後轉而任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

余入學時，研究所尚隸屬於中文大學，至1974年由於研究所諸師與中大校長李卓敏之辦學及學術理念有所不同，故決定離開中大，自行獨立，並接受台灣教育部之資助，此研究所畢業生日後均能獲教育部頒授學位之由來。

其時研究所所長為唐師君毅，教務長為趙潛先生，所內共分文、史、哲、佛學四組。史學組導師為蘇師慶彬，任教中國史之老師，包括嚴耕望、全漢昇、王德昭、陳荊和、羅夢冊，孫國棟等數位。而余英時亦於此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皆一時之選。而研究所尤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師，為熊十力之弟子，最為著稱，新亞研究所亦因其三人而成為1949年後新儒家之學術重鎮。

史學組導師蘇慶彬原為魏晉南北朝史之專家，然其時開始從事編纂《清史稿》索引，並由同班戴桂冠協助。故研究所存有大量蘇師編纂索引之咭片，蔚為大觀。入學後，除需修讀英、日語文外，先後修讀耕望師、德昭師及復觀師三位任教之學科，而論文導師則由孫師國棟指導。諸師皆學問淵博，獲益匪淺。余於師大攻讀時，其初研究興趣在於近代史，而師大亦以此著稱，後受際鎰師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之影響，故亦對中古史多所用心，故入研究所後即修讀耕望師任教之科目——中古史研究及中國歷史地理兩科，所受教益最多，故先談耕望師。

耕望師為賓四先生國內任教時之弟子，獲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著稱，並已自闢歷史地理研究之蹊徑。所講授中古史一科，上學期主要介紹中古史史料、治學方法及其生平所遇師友之學行，日後並將其課堂所講，擴充而成為《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及《錢賓四先生與我》三本小書，實為治中國史入門的最佳讀物，耕望師之專史研究，實屬藏之名山之專門著述，讀之者少，知之者亦希矣。惟獨此三本小書，使其為史學界人所共知。而下學期則以其撰寫有關政治制度及歷史地理之專題論文，抽取若干篇講解其研究來由及心得。耕望師之史學，奠基於史料，故其研究創獲之光輝皆由史料而得。曾於課堂上自謂其歷年研究唐代交通路線後，最終發現了唐代的國界，此為其於唐史研究之發明，由此可見，耕望師史學研究之精細及真相發明之功力。

至於中國歷史地理一科為大學部之科目，然所修學生不多，蓋因耕望師之普通話，不易為香港學生所聽懂。當時一齊上課，尚有今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蘇基朗，基朗於中大畢業後，亦至澳洲國立大學進修博士。耕望師所講歷史地理，起自史前，下迄唐宋，對疆域、氣候、物產、交通、城市，多所論述，余修此科，國史造詣由是大進。

余隨耕望師研習時，得以相知，一度邀余隨其研究中古之四川。然由於任教中學，工作量甚大，難以靜心細讀中古史料，故最後仍選取近代史作為碩士論文題目，至未能成為耕望師之入室弟子。然而研究所期間，受其教益最多，對於耕望師治史之學行品格，終生不忘，其所主張「讀人人能讀之書，講人人不能講之說話」，以及「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至今尤奉為個人治史、處世之圭臬。

此外，在中古史一科，同班尚有屈啟秋及劉福注兩位，皆中大歷史系1973年畢業生。該年畢業生除前曾提及相識之陳懿行、何漢威外，日後浸會歷史系同事周佳榮及鮑紹霖兩位均為同屆。啟秋現為新亞中學校長。故余與中大歷史系73屆最具緣份。不但先後成為同學、同事，亦多為好友。

德昭師早年任教師大之西洋史，並出版《國父革命思想研究》（1962）一書，早已著稱於台灣史學界。余在師大之受業諸師如王爾敏、呂實強、王家儉、李國祁、李恩涵等，均曾受教於德昭師，故早已知其大名，德昭師後至南洋大學任教，再至中大，並出任文學院院長。時開「中國近代思想史」一科，以中國近代史上之改革及革命家思想作為講述內容，始於清中葉龔自珍而迄於五四之陳獨秀及李大釗，德昭師出身北大，留學哈佛，學兼中西，且口才卓越，聽其講課，娓娓道出，論述精彩，實為學思上之享受。德昭師時因章士釗病逝香港，參與扶靈，而被視為右派中之“變節”者，此冷戰時代，左右對立意識形態所導致。由於新亞研究所與台灣國府關係密切，故德昭師與研究所之關係未能維持。余本擬隨其撰寫碩士論文，終因此而未能成功。

德昭師於中大研究院時，先後指導林啟彥、陳萬雄及周佳榮三位，後皆至日本廣島大學留學。佳榮、啟彥二位日後均來浸會任教，獨萬雄至商務印書館任職，而今成為出版界名人。由於皆曾受教於德昭師，而德昭師晚年致力於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故我們皆先後受其影響，從事辛亥革命史之研究，此亦80年代浸大歷史系以此作為起家之研究課題。

德昭師於中文大學退休後，本擬專心著述，可惜不久即因腦溢血而去世，未能在史學研究及著述上留下更多成果，至為可惜。其臨終前一年，曾至浸大歷史系演講，時系主任劉家駒先生（研究所第6屆畢業）於演講前致辭，謂德昭師為本系老師之老師，德昭師頗為快慰，演講後並同至尖沙咀「鹿鳴春」京菜館午膳。該餐館為60至70年代新亞及香港學術文化界常至聚餐之地。師生至為言歡，然德昭師卻不久即行逝世，未竟其業。

復觀師被尊為當代新儒學大師，著作等身，然尤擅長撰寫政論文字，文字氣勢磅礴，《突破雜誌》故創刊人及主編蘇恩佩曾面告余，謂復觀師為香港撰寫時論之高手，中文尤佳絕。復觀師受聘於研究所後，講授《史記》及《文心雕龍》兩科，至為叫座。其後新開《漢書》，余即選讀，然講至〈后妃傳〉，因江青與四人幫專擅，話題一轉，竟然談論中共政治，直至學期結束。故該科實為漢書與當代中國政論合講，由於復觀師曾與中共領袖接觸，講論時栩栩如生，如見其人。復觀師於東海大學任教時弟子蕭欣義為其編刊文錄，其中一冊為《論中共》，即復觀師於堂上所講論者。

復觀師熱愛中國學術與文化，對儒家思想終將開拓中國民主，倡論尤多，一次研究所師生同遊青山，復觀師侃侃而談儒家民本思想終將使中國與西方民主接軌，時余年少，起而論說，並謂中國政治文化中始終欠缺希臘城邦的民主投票及罷免制度，不易成事，致使復觀師頗為不悅。然復觀師對於傳統儒家思想的持守及更新之願望，至今尤在余中心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處於廿一世紀的今天，所謂“全球化”而實為“西化”的華人學術界及社會中，益增對復觀師思念之情。

國棟師為余在研究所之論文導師，其初本擬隨德昭師撰寫論文，然因上述因素，君毅師代為安排由國棟師指導。國棟師為唐史專家，亦為本港華文史學界首先以計量方法研究唐宋之政治及社會史之學者，其《唐宋史論叢》一書，可見其研究之功力。國棟師時為新亞歷史系主任，行政工作十分忙碌，兼且余又研究清代福州城市發展，與其研究領域不同，故給予相當自由，自行探索。然國棟師建議，須向全漢昇師請益，此即日後旁聽其中國近代經濟史一科之由來。全師講授該科，以其生平部份著述，建構出一本中國近代經濟史講義，講書有條不紊、論述清晰，使余對明清經濟史上重要問題如絲銀貿易、米價、人口、新式工礦、交通企業獲得嶄新之知識，有助碩士論文之撰寫。及余論文完成，校內口試委員，即由孫、嚴、全三師主考。



研究所攻讀時，除上課、讀書、撰文外，尚有月會及於農圃道圓亭舉辦的中國文化講座演講會。其中最為難忘者乃曾出席兩次演講會。一為牟宗三師演講士在國史上之發展，牟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在兩小時的生動演說中，全面地勾勒出中國士階層的思想及其發展脈絡，令人折服。

另一則為余英時主講〈史學、史家與時代〉，余為其中一名記錄者。該演講始於說明蘭克（Leopold Von Ranke）之科學史學如何與清代乾嘉考證結合而形成當前考証史學的專題研究之風氣。繼而指出近日西方學術界對蘭克史學之反省而帶出史家、史學與時代具有密切關係，並指出當前我國史學界除注意專題的分析研究外，應投身撰寫通論的綜合研究，方能顯示史學「古為今用」之價值。余氏中西史學素養深厚，論述清晰而發人深省，演說辭日後刊登於《幼獅月刊》，並收入余氏《歷史與思想》一書。該文實為二十世紀我國新史學的重要文獻。

此外，尚有可一記者為研究所於開學禮時，例由君毅師率領全體師生，向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像行三鞠躬禮。而每年春節諸生則必至研究所諸師家中拜年，藉以加深師生之感情，凡此種種皆可見研究所尊崇中國文化之精神意向。

50年代國變後研究所師生於殖民地共同致力於中國學問之情境，撰寫此文時，仍歷記在心頭。上列諸師雖或相繼離世，或已垂垂老矣，然新亞以民間學人發揚中國學術文化使薪火得以相傳，顯然已成為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的共同記憶，也許這是中國民族與文化仍能更生恆常不容忽略之原因。

【作者簡介】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 【專題論文】

# 明代土木之變與朝鮮的對應

范永聰

## （一）引言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汗也先大舉南侵，兵分三路，一路由脫脫不花及兀良哈率領，攻遼東；一路由阿剌統領，攻宣府，進圍赤城；也先則親率大軍攻大同，進迫北京。

[1] 英宗在權閹王振慝下，倉促領五十萬大軍親征，至土木堡，竟為也先所敗，王振身死，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sup>[2]</sup> 此事不僅對明室政局帶來巨大震動，與明朝有著密切宗藩關係的朝鮮李氏王朝，<sup>[3]</sup> 對事變發生後中國局勢的發展，也甚表關注。

歷來學界對土木之變雖然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利用中國本身的史料，而忽略了朝鮮方面的有關記錄。作為明室最忠實的藩屬國之一，朝鮮對土木之變的反應，當然值得深入檢討；至

於朝鮮王朝的官方史籍——《朝鮮王朝實錄》中所保留的材料，亦可補中國史籍的不足，實在不宜忽略。

## （二）朝鮮對也先南侵中國的反應

也先大軍南侵中國的同時，脫脫不花及兀良哈的部隊也在遼東一帶進行搶掠。朝鮮世宗三十一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朝鮮遣往中國的通事李裕德向世宗報告有關遼東地區的情況：

八月戊申朔〔初一日〕，通事李裕德自遼東先馳報云：「臣謁見都司王大人，言西有聲色甚急，外郎謝本曰：『今七月二十日，達達也先兵馬夜入長城，廣寧總兵官不知賊入，出校場散銀於軍士，也先兵馬直來，總兵官與軍士奔入城內，閉門自守。也先兵馬圍城三重，虜軍卒一千，馬八千匹。』又自廣寧至遼東站路，人馬奪掠殆盡。先騎至遼東西門，臣亦狼狽出來。」是日夜二鼓，報至，即召兵曹都鎮撫，議兩界隄備之事。<sup>[4]</sup>

遼東地區在鴨綠江西北部，是朝鮮與中國之間陸上交通的樞紐，也是專供中朝兩國使節往來使用的「貢路」所在，對朝鮮北部的國防非常重要。基於這個原因，左議政河演等在收到李裕德來自遼東的報告後，立即向世宗建議盡快派遣通事前往遼東，偵察關於也先入寇中國的真相，同時派大將前往西界及北界，佈置警備。另外，除了防範也先的勢力外，也必須提防「野人」（即女真人）趁機南侵。世宗對河演等人的建議十分同意，於是派遣通事金自安及姜文寶二人起程前往遼東，並命北邊兩界立即加強守備。<sup>[5]</sup>

在派員前往了解遼東地區局勢的同時，雖然大半遼東地方已落入也先手中，貢路也告阻塞，朝鮮使者勢難進入中國領土，但朝鮮世宗依然堅持派遣使節金宗瑞<sup>[6]</sup>入華朝貢，藉以表達朝鮮對「事大政策」的堅持，《朝鮮王朝實錄》中載：

八月庚戌〔初三日〕，傳旨議政府：「也先兵侵擾遼東，而都司尚在，則我國使臣，縱不能達於京師，當入都司，俾朝廷知我意也，若也先殺掠都司官吏而還歸本土，站路盡空，則使臣不可累日裹糧而行。然臣事既久，不可一朝忽焉不朝。昔宋南遷，高麗事之，不廢其禮，況在今日乎？在我之道，雖死必朝。而路梗若此，將如之何？聞有水路，自義州可達京師，今宗瑞之行，宜訪義州父老。若漫散軍入境，何以待之？」僉曰：「雖路梗二、三次，使臣死亡，不可不朝，漫散軍不可使入境，又不可侵害，但當堅壁不納。」上然之。<sup>[7]</sup>

由此可見，在朝鮮君臣心目中，到中國朝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使遼東地區的情勢再危險，金宗瑞出使明朝之旅，也是事在必行。

朝鮮世宗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朝鮮通事金自安到達遼東。他派人先回朝鮮，向世宗報告其所見聞。金氏聲稱在遼東遇到一名隸屬明朝東寧衛管治、名叫朴鎮的朝鮮人，朴氏對他說瓦剌大軍進犯中國東北大城廣寧，強攻三日而不得入。不過廣寧守將過於輕率，以為瓦剌一敗之後便不會再次入寇，三番四次忽視瓦剌將會再次進侵的情報，對軍事防備也不在意。結果瓦剌果然再次進侵，一舉攻陷廣寧，後更大肆擄掠人畜。被瓦剌軍俘虜的朝鮮人及女真人被迫辮髮，並改穿瓦剌服式；至於被俘的部分漢人，則慘遭割鼻酷刑。剩餘的朝鮮人在極度惶恐下大批向鴨綠江南方逃亡，試圖進入中朝邊境第一重鎮義州。<sup>[8]</sup>

與金自安一同被派往遼東的朝鮮通事姜文寶於八月十八日回到朝鮮，向世宗匯報遼東地區的情況：

八月乙丑〔十八日〕，通事姜文寶還自遼東，啟曰：「臣見鎮撫〔筆者按：即遼東鎮撫〕王璜，問之，答曰：『廣寧、遼東間站路，皆為達達所掠，殺虜人畜數萬。時未知達達去處。』指揮吳良會入達掛地面，被留，密使人奏秋初達達將犯中國。七月十七日，皇帝〔即明英宗〕領兵八萬親征，出居庸關，行至長安嶺，都督楊弘三父子伏兵山間擊賊，擒殺四萬餘級。但傳聞此事而時未有文移可考。遼東等處，晏然無事。」<sup>[9]</sup>

至此，朝鮮始獲「傳聞」，得知明英宗親率大軍北征瓦剌之事。雖然兩軍勝負還未得知，但朝鮮世宗向一眾官員明言：「自古我國當中國危亂之時，雖至播遷，不事新主而事舊主。我國之誠，於此益著。至今傳言，若今果皇帝親征，道路雖梗，要須遣使得達我國之誠可也。宜速探候的實聲息」，於是派遣通事金辛及李從衍前往遼東，再探消息。<sup>[10]</sup>及至八月二十七日，又以慶昌府尹鄭徐如為「聖節使」，前往北京朝賀「聖節」。<sup>[11]</sup>

朝鮮世宗三十一年九月初二日，被派往遼東的通事金辛在朝鮮北部的青石嶺遇見已渡過鴨綠江五日、正往南行，準備進入漢城的明朝遼東指揮王武。王武手上持有明朝給朝鮮國王的勅書，書中有言：「皇帝七月十七日親御六軍出居庸關，至大同城。達達敗走，帝亦不窮追，八月十八日回駕。」<sup>[12]</sup>不過，此勅書的內容明顯對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一事有所隱瞞。根據《明實錄》的記載，「土木之變」發生在八月十五日，明英宗於是日被瓦剌俘虜，又何來「皇帝於八月十八日回駕」？<sup>[13]</sup>

### （三）明朝徵兵朝鮮及朝鮮的回應

明朝遼東指揮王武於九月初九日到達漢城，立即與朝鮮世宗會面。他此行之目的原來是向朝鮮徵兵「十數萬」，以解明軍在漠北之困。王氏帶來明英宗給予朝鮮世宗的勅書，內言：

自古胡虜畜狡黠之心，為西北之患，然其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揆之古今，皆未嘗有出斯理者。自我聖祖受天明命，掃除胡元之亂，而其醜類之遁居沙漠者，或相吞噬，或相戕害，凋敝之甚。此雖天之降禍，亦自作孽之不可逭也。今其殘黨酋長有名脫脫不花及其屬也先者，逃居漠北，比歲遣使來朝貢馬。朝廷不鄙夷其黨，特遣人給賞。邇者此虜聽信姦謀，逆天背恩，侵犯遼東等處邊境。迺西邊將，殺獲醜類甚眾，遼東亦追逐出境，雖虜鼠竊狗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聞脫脫不花等明說：「欲復來犯邊，就率眾掠王之境及侵劫女直〔筆者按：即女真〕人畜」等辭。且邊境軍民，朝廷固所當保全。王國密邇東陸，世為禮義名藩，與國休戚相同，豈可漫不加恤？蓋此虜深得將取必與之機，往往以結和為言，或以勢力相脅。未燭其姦者，一與之交，則歎侮毒害，甚於豺狼。恐王不知其奸，特遣勅諭王。至日，其嚴飭守邊頭目人眾，謹防此奸，毋為所欺，貽害國中。……虜寇既有侵犯之謀，必須剿除，以祛遠近之害。已勅遼東提督軍務都御史及總兵、鎮守、參將等官，整擻驍雄精銳將士一、二十萬及調度女直、野人、夷兵人馬數萬，專候殺賊。今念王世以忠義相承，洞明順逆之理，王宜調集精兵十數萬，令大頭目統領，與遼東諸將大兵約會夾擊，期在撲滅此賊。若此賊亡滅，庶幾上順天道，下合人心，非惟遼東之利，亦王國之利。朕嘉之忠義，必大頒恩賚，凡國之頭目有功者，皆厚賞不吝。王國為國為民，以副朕懷，其亮之！其亮之！故諭。<sup>[14]</sup>



朝鮮世宗收到這份勅書，當然已知道事態嚴重，甚至對明英宗在漠北的情況，作了最壞打算，故他嚴令諸大臣對此勅書的內容「秘不發」。至於王武，他以明室遼東指揮的尊貴身份來到朝鮮，更是奉明英宗之勅書而來，世宗自然對他禮待極厚，可說是與「朝官無異」。<sup>[15]</sup>

朝鮮世宗禮待王武之原因，除了因為他是天朝來使外，還當與明朝的徵兵要求有關。朝鮮兵力本不強大，要在短時間內徵集「十數萬精兵」前往遼東，協助明室討伐瓦剌，實有一定難度。為防止最終因徵集失敗而與天朝結怨，奉承遼東指揮王武是當時首要的外交工作。<sup>[16]</sup>不過，奉承歸奉承，天朝徵兵的問題始終要面對。為此，朝鮮世宗於九月十九日任命漢城府尹金何為謝諭使，出發前往北京，旨在奏請大明天子，免除徵兵朝鮮之命。<sup>[17]</sup>《朝鮮王朝實錄》對此事有以下詳細的記載：

欽惟聖上憐憫小邦，諭以虜情反復，謹飭隄防。聖訓丁寧切至，臣不勝感激欽遵外，竊念調集精兵，與遼東諸將約會夾擊一節。本國東、西、南三面，皆岸大海。倭山對馬、一歧、花加等諸島，羅列海中，群賊滌忽往來，世為邊患。此自平安道義州迤南，歷黃海、京畿、忠清、全羅等道，至慶尚道寧海府，并傍海民居及要害諸島，出入迤邐，共八千餘里。又自江原道平海郡，至咸吉道慶興府，約二千餘里。陸置屯兵，海設戰艦，列戍相望。然猶倭賊出其不意，為患不已。……又北一面諸種野人接連居住，無時擾攪。以此自義州迤北至慶興府約三千餘里，大小城堡，戍兵屯列，然且滿住、凡察及古州速平江等處，諸種野人蓄嫌報復，固非一日。緣此四面無非受敵，去處數多，水陸守備，嘗加戒嚴。矧今南北聲息，連續不絕，防禦事務，倍緊前昔，戍守士卒尚有不敷，若分些少軍馬出赴境外，誠慮倭寇、野人乘間作耗，為害非輕，亦貽聖上東顧之憂。審度事勢，進退惟谷，戰兢無措。儻或北胡來犯小邦，臣當盡力剿擊。伏念自臣祖父〔筆者按：即朝鮮太祖李成桂〕以及臣身，厚蒙列聖恩渥，保守小邦，凡有朝廷之命，盡心欽依，圖報萬一。若有分寸餘力，安敢罔冒天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sup>[18]</sup>

朝鮮世宗以南面倭寇及北面野人猖獗為藉口，試圖免卻明室徵兵之命，雖有託辭之嫌，但他所說的，卻是事實。特別是倭寇問題，自高麗王朝末年起便一直困擾朝鮮半島，到朝鮮世宗朝時，倭寇的勢力依然甚大，雄據不少海島，對朝鮮王朝的生存造成嚴重威脅。<sup>[19]</sup>

雖然朝鮮婉拒了天朝徵兵的命令，但明室亦無追究。不久，明景帝即皇帝位的消息傳至朝鮮，朝鮮隨即面對效忠對象的選擇問題。

#### （四）朝鮮對明景帝即位的反應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英宗於土木堡被瓦剌所俘，北京朝野震動。兩天後，北京收到英宗被俘的消息，群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理力主遷都南京（應天府），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八月二十二日，皇太后命立皇子朱見深為皇太子。及後英宗被瓦剌帶至威寧海子，明廷知英宗歸還之日遙遙無期，乃於九月初六立郕王為帝，改元景泰，是為景帝（代宗），並遙尊英宗為太上皇。<sup>[20]</sup>

朝鮮收到明景帝即位的消息，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當時身為「聖節使」之一的鄭陟正在遼東，他得悉明景帝即位之後，立即派人回國報告。<sup>[21]</sup>朝鮮世宗三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通事金精秀自遼東回國，抄還明朝皇太后詔及新皇帝登極詔，至此朝鮮證實明景帝已即皇帝位。按照天朝宗藩制度的規定，朝鮮必須立即遣使至北京進慰表、賀登極及賀正朝，世宗乃命中樞院事李明晨

於十月十三日起行，往進慰表。三日後，世宗又派右議政南智、中樞院副使趙遂良前往京師以賀景帝登極；同時又命同知中樞院事權孟慶及慶昌府尹馬勝往賀正朝，並賀皇太子之冊立。<sup>[22]</sup>

正當中朝兩國間的一切外交活動順應著天朝宗藩制度的規定而運作之際，朝鮮卻於十月十八日收到謝恩使金何於遼東發出的報告，明言：「遼東人言也先以兵三千送還正統皇帝」。<sup>[23]</sup>這對朝鮮來說，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很震撼的消息，因為若果英宗順利回國，並重奪帝位，則朝鮮慶賀景帝即位一事，難免惹來英宗之反感。由於事件關乎朝鮮與明朝的外交關係，如果處理不周，甚至對國運也有極大的影響，故朝鮮世宗不敢怠慢，在收到金何的報告後，便立即召開會議：

上召廷臣謂曰：「中國之變，千古所無，送還皇帝，亦是意外之事也。也先之意以謂一則正統還入，則與景泰必有猜疑，以成內亂，如此而徐觀其勢，欲施其策；一則聞中國立正統之弟為皇帝，雖使拘留不還，終為無益耳。意不出此二者。因此而料之，則中國以皇太后之命復立正統，亦或有之矣。若然，則正朝表箋以景泰紀年，甚為不切，處之何如？」河演等曰：「進慰、登極、正朝使姑留義州，先令通事往遼東詢之。若果正統復位，則停進慰、登極使，正朝表箋改以正統紀年。」鄭麟趾<sup>[24]</sup>獨曰：「景泰今已即位，布告天下。我國以正統紀年，於義不可。似若不知而入朝可也。」……於是遣通事金有禮于遼東。正統皇帝實未還也。<sup>[25]</sup>

透過朝鮮君臣這段對話，除了可以看到有「海東堯舜」之稱的朝鮮世宗一語道破也先在土木堡劫持明英宗的動機，展現了他對時局的驚人洞察力之外，更可以了解到自朝鮮開國以來，其對中國的「事大外交」其實富有很大的彈性。「事大外交」的最主要精神是「事大以誠，保國之道」。朝鮮對中國恭敬，盡力在天朝宗藩制度內扮演一個忠實藩邦之最終目的，實為博取中國的承認及保護，藉以確立自己的統治權。所以，誰也可以成為中國的君主，只要他有正統的地位，能賦予李氏王朝統治朝鮮半島的權力即可。<sup>[26]</sup>河演等人提出「進慰、登極、正朝使姑留義州，先令通事往遼東詢之。若果正統復位，則停進慰、登極使，正朝表箋改以正統紀年」的建議，正好體現了「事大以誠，保國之道」的中心思想，亦展現了朝鮮對華外交的彈性。

及後，隨著明朝名將于謙擊敗瓦剌，景帝的帝位總算穩保下來。朝鮮世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朝鮮收到身在中國的正朝使權孟慶的報告，內云：「皇帝克捷達達，頒詔海內。」<sup>[27]</sup>世宗因而得知景帝的地位愈益穩固，英宗在中國已再無任何影響力，朝鮮之間的關係遂宣告再上正軌。

## (五) 結 語

透過探討朝鮮對一些中國突發事件的反應，除了可以彌補中國史料記載的不足外，更可觀察到朝鮮在天朝宗藩制度下如何發展其外交關係，並進而明瞭傳統東亞秩序的實際運作情況。從中韓關係史的角度來看，土木之變反映了明朝與朝鮮兩國之間宗藩關係的運作模式，故此事變誠為古代東亞史上一件大事。縱觀朝鮮對土木之變的反應，由最初派遣使節前往遼東探究實際情況，到婉拒明朝徵兵十數萬的詔命，以至景帝即位後對效忠對象的選擇，處處可見朝鮮王朝的外交智慧。

朝鮮對土木之變的反應，理應被列作為了解傳統東亞秩序的最佳個案之一。朝鮮本著「事大以誠，保國之道」的彈性外交精神，除了能避過捲入土木之變而又不被天朝責難之外，更於新君景帝即位後迅即與明朝「更新」宗藩關係，從而維持了她作為中國最忠實藩屬國的崇高地位。朝鮮王朝對「事大外交」的執著，以及她這種高明的外交手段為國家帶來了非常可觀的回報。日後

明神宗萬曆年間（1573–1619年），朝鮮因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的入侵而展開歷時七年的「壬辰衛國戰爭」（或稱「壬辰倭禍」，1592–1598年），幾至亡國，明朝不顧自己的內外困局，出兵協助朝鮮復國，損失大量人力物力，更間接導致明朝的衰亡。明朝之所以能對朝鮮作出無私的付出，除了源於天朝宗藩制度之下，中國對藩屬國的保護義務外，實因為中朝「兄弟之邦」的深厚感情所致。相比其他明朝的藩屬國如安南、琉球及東南亞諸國，朝鮮的地位明顯崇高得多。由此足見朝鮮對於傳統天朝宗藩制度的實質有著透徹的了解，並能確切達到「事大以誠，保國之道」的外交理想。

【作者簡介】范永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 [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十四冊，頁8500。
- [2] 有關土木之變的詳細經過，可參閱【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十四冊，頁8500–8501；並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一冊，頁138–13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第三十冊，《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967年），頁3495–3499；孟森著：《明代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年），頁126–129；Frederick W. 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in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3–272；黎東方著：《細說明朝》（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228–238。
- [3] 明朝初年中國與朝鮮的交往並不順利，兩國之間的宗藩關係更因表箋、女真人口遷移、海寇、朝鮮入貢次數、貢馬數量等外交問題而漸趨惡化。不過，朝鮮一向重視與明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故極其努力地改善明室對她的觀感。歷經三十餘載，朝鮮太宗李芳遠終在明成祖永樂元年（朝鮮太宗三年；1403年）獲得明室的封賜誥命，正式被中國冊封為朝鮮國王，兩國關係自此遂告穩定，而朝鮮亦成為中國最忠實的藩屬國。關於這段歷史，詳見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年），頁178–192。
- [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年），《世宗實錄》，四，頁14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裕德向朝鮮世宗報告脫脫不花部隊在遼東一帶進行搶掠之時，「土木之變」尚未發生。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八月戊申朔日，英宗大軍行至大同，尚未與瓦剌軍交戰。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第三十冊，《明英宗實錄》，頁3495。由是足見在「土木之變」發生之前，瓦剌大軍早已進佔遼東地區，並大舉搶掠。
- [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0。
- [6] 金宗瑞除了是一位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者外，更是朝鮮王朝初期一位極出色的史家。他所編纂的《高麗史節要》於朝鮮太宗十五年（明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年）成書，是現今研究高麗王朝歷史不能或缺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參閱簡江作著：《韓國歷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頁284。
- [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1。
- [8] 同上，頁142。
- [9] 同上。不過，此處明言瓦剌入寇，明英宗「領兵八萬」親征，則與中國方面的史料記載有很大出入。據《明史》記載，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八月辛酉日，英宗及其大軍抵達土木堡，旋被瓦剌大軍圍困，諸大臣倡議入懷來以避瓦剌兵，但王振卻以輜重未到為由，力排眾議。次日，也先大軍向明軍進攻，明軍士卒爭先走避，死者「數十萬」，其中包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等五十多位重臣，王振亦身死，英宗則被迫「北狩」（實為瓦剌所俘）。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一冊，頁139；並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十四冊，頁8500–8501。故明英宗出師北伐時，人數當在十萬人以上。著名明史專家孟森指出，明英



宗北征時，大軍及官員私屬總計約五十萬人，應為準確。參閱孟森著：《明代史》，頁127。

- [1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3。
- [11] 同上，頁144。另所謂「聖節」，實即明朝皇帝的生日。故「聖節使」即為朝鮮國王派往慶賀明朝皇帝生辰的特使。參閱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82。
- [12]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5。
- [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實錄》，第三十冊，《明英宗實錄》，頁3498–3499。
- [14]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勅書的內容只見於《朝鮮王朝實錄》，中國方面的史料如《明史》及《明實錄》等對此勅書均無明確記載。
- [15] 王武到達朝鮮後，被請到專門接待天朝大臣的「太平館」居住。朝鮮大臣如右承旨李宜等均奉世宗之命厚待王武，除了以美酒佳餚款待他之外，朝鮮世子更親自於太平館為他設宴。另外，世宗又命都承旨李思哲贈貂裘、貂冠及皮靴等物（此皆為朝鮮王國的貴重品）予王氏，足見王武在朝鮮獲得極優厚的待遇。詳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7。
- [16] 朝鮮建國初年曾因表箋、女真人口遷移、海寇、朝鮮入貢次數及貢馬數量等外交問題而與明朝失和。不過為了得到明朝對其統治的承認，朝鮮一向致力改善其外交技巧。其中一種改善方法為擴大發展外交的對象與範圍，或可稱之為「雙線外交」。自朝鮮初年起，除了與明室發展「官方關係」外，還努力與明朝來使、明室諸親王及重要人物等發展「私交」關係，甚至巴結奉承，以期使他們為朝鮮多說好話。例如明室燕王朱棣，在還未即皇帝位之前，便與朝鮮太宗李芳遠「私交甚篤」。日後朝鮮太宗終於得到明成祖的冊封，正式成為受中國承認的朝鮮國王，也多少受益於二人的親密關係。朝鮮對於這種外交技巧，一直沿用不棄，而且效用顯著。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詳見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89–190；並參葉泉宏著：《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54–55。
- [1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7。
- [18] 同上，頁148。
- [19] 關於高麗末年至朝鮮初年倭寇侵擾朝鮮半島的情況，詳見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41–148。另外，日、韓兩國學者對於此問題有極豐富的研究成果，較為重要的著作有田中健夫著：《中世海外交涉史之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9年）及李鉉淙著：《朝鮮前期對日交涉史研究》（漢城〔首爾〕：韓國研究院，1964年）兩種，足為此問題參考之資。
- [20]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一冊，頁139。
- [2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48。
- [22] 同上，頁149–150。
- [23] 同上，頁150。
- [24] 鄭麟趾，朝鮮世宗朝名臣，著名朱子學者，字伯睢，號學易齋。太宗十四年（1414年）文科狀元及第。歷任集賢殿學士、副提學、侍講官、同知春秋館事、吏曹參判及刑曹參判等高等文官。世宗二十二年（1440年）出任使節赴明，翌年回國。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撰《治平要覽》。端宗元年（1453年）因功受封為「靖難功臣」，兼領河東府院君。鄭氏學問淵博，兼擅文、史及語言。世宗三十一年（1449年）與金宗瑞等名臣同修《高麗史》，為現今研究高麗王朝歷史絕不能或缺的史料；及後又與成三問、申叔舟等合創《訓民正音》，奠定現代韓語的基礎。而他與權躡合撰的《龍飛御天歌》，更對朝鮮文學、歷史及語言發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鄭氏畢生著作甚豐，較重要的有《歷代曆法》、《學易齋集》、《資治通鑑訓義》及《歷代兵要》等。參閱顧銘學、賁貴春、宋禎煥合編：《朝鮮知識手冊》（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601。
- [25]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50。
- [26] 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204。另外，關於朝鮮對明朝的彈性外交，其實早在明初「靖難之變」發生時已作出了一次極成功的「示範」。明惠帝即位之初，朝鮮已立

即向其上表稱臣。不久燕王朱棣起兵，發動靖難之役，惠帝與燕王雙方都有向朝鮮購買戰馬。基於中國的形勢極不明朗，朝鮮乃展開「雙線外交」，同時向交戰雙方供應馬匹，但名義上仍向惠帝效忠。及後燕王得勝，即皇帝位，是為成祖。朝鮮得悉此事，立即遣使祝賀成祖登極，成祖大喜，旋即正式冊封朝鮮太宗為朝鮮國王，明鮮之間的宗藩關係得以確立。有關此段史事，詳見范永聰著：《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92-200；並參【韓】朴元煥著，何桂玲譯：〈朝鮮對「靖難之役」的肆應〉，載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頁247-278。

[2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五冊，《世宗實錄》，四，頁151-152。

## 【專題論文】

### 一案四史家 "朱延豐出國案"的考察

梁晨

摘要：陳寅恪、蔣廷黻、邵循正以及朱延豐均為民國以來的一流史家，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內成績斐然，特別是陳寅恪、蔣廷黻和邵循正，其學術、思想、乃至言行至今仍廣為海內外學界關注。同時，他們四人也是同事、師生或同學，相互關係緊密。本文試圖利用清華大學檔案，對涉及這四位名學者的“朱延豐出國案”進行考察，展示他們在這一事件中的糾葛與關懷，為考察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提供新視角。

關鍵字：朱延豐、邵循正、蔣廷黻、陳寅恪、清華大學

#### 一、朱延豐其人及其與陳寅恪先生的關係

朱延豐，江蘇蕭縣人，現代知名史家。他於1925年入清華大學，主修歷史，1929年本科畢業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助教，一年後考取清華研究院，師從陳寅恪。1933年，即將畢業的朱延豐由於未能得到時任歷史系主任蔣廷黻的推薦，失去了被清華大學資送出國留學的機會。朱延豐為此多方奔走申訴，引起校內外廣泛關注，造成轟動一時的朱延豐出國案。兩年後，朱延豐考取中英庚款項目，<sup>[1]</sup>入牛津大學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深造，<sup>[2]</sup>後前往巴黎大學習歐洲史，並曾在德國波恩大學講授中國史兩年，回國後任教於東北大學。<sup>[3]</sup>

朱延豐為清華創設大學後的第一級畢業生，又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後經過陳寅恪的嚴格考查而被錄取為研究生。由此推想，陳寅恪對朱延豐的各方面情況應該是比較瞭解且滿意的。而1933年3月23日，朱延豐的畢業初試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陳寅恪認為朱的答卷雖然“精深處尚少”，但也“難能可貴”；朱自清則更是認為朱延豐“答甚佳，大抵能持論，剖析事理頗佳”。

[4] 朱延豐的學術能力得到了朱自清與陳寅恪兩先生的認可。



另外，陳寅恪對朱延豐的生活也頗為關心，這也是其對學生的一貫態度。朱延豐入研究院後，曾經愛慕上北平女子籃球隊的一位女子，但戀情半年後即告終止，這令朱延豐十分痛苦，甚至因此離校曠課達兩個星期之久。陳寅恪為此很是著急，不僅自己尋找，還特地令朱延豐的同學羅香林去尋找。<sup>[5]</sup> 朱延豐回來後，陳寅恪知道他心情鬱悶，便把他推薦給胡適去幫著搞點翻譯工作，以為寄託。同時，陳寅恪還去函胡適，希望其能親自和朱延豐進行一次面談。<sup>[6]</sup>

當然，陳寅恪對學生的評價和推薦向來也是公允的。在向胡適推薦朱延豐去做翻譯工作的同時，他還推薦了中文系教員浦江清。雖然陳寅恪希望兩個人都能得到翻譯工作，但在向胡適介紹這兩人時陳寅恪又是很公正的。他認為浦江清是學西洋文學出身，又研究元曲，對中西文學極有修養，白話文亦流利，擔任翻譯工作是沒問題的。而朱延豐是專門研究歷史的，“他的翻譯正確應該是可能的，但能流暢與否，還需要讓他翻譯一樣稿，方可評定。”<sup>[7]</sup>

由此可知，陳寅恪對朱延豐這個學生既關心愛護也嚴格要求。朱延豐的學術能力基本得到了陳寅恪的認可，雖尚有不足之處，但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可造之才。陳寅恪對這個學生可謂是知其長亦知其短。在生活上，陳寅恪對朱延豐關心備至，為朱延豐安心治學盡力製造條件。

## 二、“朱延豐出國案”的由來與經過：蔣廷黻推薦邵循正，無視朱延豐

清華於1925年開設大學部，到1928年正式建立國立大學，其目標就是要將國外的大學教育引入國內，大幅度減少派遣留學生的數量，以使用有限的資源為國家培養更多的高等人才。這是清華辦學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轉變。

到1929年6月，清華大學模仿西方模式設立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清華研究生院先辦文法二科，次辦理、工、農三科。研究院院長、所主任和部主任則分別由大學校長、各學院院長及各學系主任兼任。<sup>[8]</sup> 清華各研究所採取精英主義，要求特別高，學生人數很少。到1936年清華研究院共有三所十部，學生也不過四十三人。<sup>[9]</sup> 這些研究生畢業後，少數成績和論文都優秀的，可以由學校資送出國深造，<sup>[10]</sup> 這即為“朱延豐事件”的背景。

1933年11月9日，在決定該年資送出國研究生人選時，雖然歷史系朱延豐、邵循正兩位畢業生的課程和論文俱佳，均符合資送出國的條件，但歷史系最終只推薦邵循正一人出國留洋，並由蔣廷黻親自致函教務長，請求其在校評議會討論派遣學生之時，代歷史系提出這一要求。<sup>[11]</sup>

系?的決定讓一心想出國的朱延豐很是意外。朱延豐比邵循正高一屆，又是歷史系本科畢業，還曾任助教一年，進研究所後更師從史學大師陳寅恪。邵循正不過是政治學系本科畢業後才轉來歷史系的“新人”。輸給這樣一個對手，讓朱延豐很不服氣。他立即給系主任蔣廷黻寫信，認為：根據研究院的章程“成績上等的畢業生，得由系主任推薦給評議會”，也就是說只要成績上等的學生，系主任就必須向評議會推薦，再由評議會從推薦人中進行選擇，所以蔣廷黻沒有權力不向評議會推薦自己。蔣廷黻回信表示：這是對章程規定的誤解。研究院章程提到“得由系主任推薦”那麼也就可以“不由”系主任推薦。因此主任是有決定之權的。不過若校長或評議會認為另有解釋，須行推薦，即可照辦。<sup>[12]</sup> 蔣廷黻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同時也將事情的解決權轉移給更具權威的校評議會和校長。如果朱延豐知難而退，不再糾纏，那麼這個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如果還是不服，那麼他就該向評議會和校長申訴，而不再直接糾纏蔣廷黻本人。

朱延豐顯然並不想就此甘休。11月29日，他在給校長梅貽琦的信中說到：“頃聞國外研究生已由各系推薦於評議會，但生並未被歷史系主任提出，不勝驚異！查生之成績，足夠推薦標準，而竟未被推薦，不足據何理由。據係數同學之意見，‘得由’之反面為‘不得由’而非‘不由’。得由系承上文而云，蓋謂如成績夠上標準時，始‘得主任推薦’，否則‘不得由’。故‘得由’‘不得由’係依學生成績而轉移，而非從一、二人之專斷。換言之，即應憑客觀的條件為前提，而不應由主觀的臆斷。……故成績達到‘得由’之法律標準時，則主任即無法律的理由認為可以‘不由’彼推薦。”<sup>[13]</sup>另外，他從研究院章程中尋找依據，並上書清華評議會。

半個多月以後的12月16日，清華大學評議會經過討論，得出結果：畢業生成績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薦於評議會一條，其在手續上應經系主任之審核，非成績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薦。<sup>[14]</sup>這也就意味著蔣廷黻不推薦朱延豐而只推薦邵循正是完全符合規定的，並無不當。

朱延豐並不是個會輕易放棄的人，面對校內最高權威機構的決定他也並不準備妥協接受。12月19日，朱延豐再次上書評議會，認為蔣廷黻損害了其合法權益。<sup>[15]</sup>隨著事件的擴大，朱延豐的情況得到了同級同學的同情。在其第二次上書評議會後，第一級畢業留校的全體學生也聯名上書梅校長，為朱延豐鳴不平，要求校方重新考察歷史系的決定。

但面對朱延豐的申訴，評議會依舊堅持原先看法，並沒有支持朱延豐。<sup>[16]</sup>得不到校長和評議會的支持，也就意味著朱延豐不可能通過校內活動來達到目標了。為此，仍不願放棄的朱延豐只有求助於具有更高權威的校外力量。於是朱延豐接著上書國民政府教育部，稱自己在清華遭受了不公平待遇，認為蔣廷黻完全是出於個人感情的原因，公報私仇，徇私舞弊，借出國事來打壓自己。而校長和評議會又和蔣之間互相勾結維護，使自己在校內無法得到公正。他要求清華重新審議其出國一事，並要求蔣廷黻從評議會中迴避（因蔣是文學院院長，是評議會成員），並進而指責蔣廷黻把持校務，破壞行政。教育部對此事給予了一定關注，但並沒有過多干涉，只是給清華去了一紙命令，告訴校方朱延豐的意見並請校方說明情況。<sup>[17]</sup>朱延豐的行動還不止於此，他甚至求助於北平著名律師張伯烈，準備必要時訴諸公堂。張伯烈為此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朱延豐的觀點，甚至指責蔣廷黻是“在玩弄文字，摧殘學生”。<sup>[18]</sup>

這樣一來，朱延豐出國案就從清華校內溢出，走向了校外，並一度引起了社會的關注。這應該是蔣廷黻以及清華校方所未料及的。不論朱延豐此舉是否適當，蔣廷黻的做法確實引起了許多不同意見和猜測，而清華研究生院章程的漏洞與操作的偏頗更是需要修正。這樣一來，清華校方就需要認真來解釋這個事件以及規程，以對各方有所交待。

### 三、朱案之解決：陳寅格出面攬責

面對上級機關和社會輿論的質問和壓力，清華方面必須盡快給出一個準確詳細的解釋，既要解釋本校的規定，也要解釋清華歷史系只選擇邵循正的理由。

就在大家都以為系主任蔣廷黻要出面做一個詳細解釋的時候，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格卻出面解釋了整個事件的原委。作為清華歷史系最重量級的教授，又是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格的出面無疑為事件的解決提供了保證。

陳寅恪1934年1月8日給梅校長寫信聲明：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先生時為主席，詢問大家意見，蓋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後，全體贊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係。苟朱君可以使弟發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至謂系主任與之有意見（無論其真有與否，即使有之，亦與弟之主張無關涉），“其他教授亦隨同系主任之主張”者，則不獨輕視他教授之人格，尤其輕視弟個人人格矣。總之，此次史學系議決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大最多之責任。此中情形經過如此，恐外間不明真相，特函陳述。如有來詢者，即求代為轉述，藉明真相而去誤會為荷。<sup>[19]</sup>

陳寅恪的聲明，首先證實只推薦邵循正是歷史系全體教授的意見，並非蔣廷黻本人獨斷。其次，提出這一建議的人並不是蔣廷黻，而是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那蔣廷黻因個人感情的問題，而於此事有所徇私，也就無從論及了。此外，也說明未派朱延豐還是考慮到其學術能力，完全是公正的。最後，由陳寅恪出面，既顯示了公平，也使朱延豐完全失去了繼續糾纏的理由，從而使整個事件到此告一段落。

果然，陳寅恪表態以後，事件遂逐漸平息，朱延豐也沒有再繼續提出異議，而校長梅貽琦也在一個月後的2月9日作出最後通告，指出：

凡本大學研究院畢業生，其學分成績至1.05，畢業考試及論文成績均在上等者，得由各系主任推薦於評議會，待審查委員會……。不曰“由”而曰“得由”者，以學分成績、畢業考試、論文成績三項指被推薦者的最低標準，還應有更高能力。若必釋“得由”為“必由”則凡已達最低限度的標準者，系主任由必須推薦的限制，評議會依方法計成績，而擇優選派的條文更屬無意義。學校是先須經本系教授的集商，再由論文導師提意見，然由多方共同協商，系內教授商議只有邵循正一人，教授未提議朱。因此校方堅持原先意見。

這既是對朱延豐出國案的最後裁判，也進一步解釋了研究院關於選派學生留學的規定。清華大學的處理意見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認可，但教育部指令清華要完善章程。為此在1934年5月，清華大學根據教育部的指令重新修訂了研究院章程，其中第十二條修改為：本大學研究院畢業生，其學分成績、畢業初試成績及論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及獲有所在部的推薦者，由評議會特組審查委員會按照下列計算方法，擇優派遣留學。<sup>[20]</sup>如此，是否得到所在部也就是系的推薦這一條件，就成了和成績、論文等一樣必備的要件，而不再是成績、論文等符合後的必然，從制度上避免了朱延豐事件的再次上演。

#### 四、餘論：事件的後續與檢討

單純看“朱延豐出國案”只是一個個人事件，談不上驚天動地。但是，由於牽涉其中的朱延豐、邵循正、蔣廷黻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歷史學界重要人物，此事的影響仍不可小覷。這個事件一方面影響了朱延豐與邵循正兩位今後史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透過這個事情我們不僅能看到陳寅恪對學生的要求，體察名師風範，更能管窺到當時蔣廷黻建設一個“海內第一”<sup>[21]</sup>的清華歷史系的構思和行動。

朱延豐在這個事件中無疑是個失敗者，雖然經過種種努力，仍然難敵歷史系的安排與校方的決定，推薦出國未能實現，心中更是忿忿不平。但是，他的不平很快就得到了撫慰。兩年以後，朱延豐考取了中英庚款項目，<sup>[22]</sup>得以去牛津學習，後亦成為我國突厥研究的名學者。



事件另一方的邵循正則無疑是贏家，雖然他本身是無意識捲入這場文案中的。邵本人早就料到了出國競爭的激烈並提前作出了安排。他於1926年秋入清華大學時與弟邵循恪同就學政治學系，主攻國際法和國際關係。但是到了1930年大學畢業報考研究院時，邵循正卻改習歷史，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避免在將來有機會被選派出國留學時與自家兄弟競爭。<sup>[23]</sup>在研究院期間，邵循正刻苦鑽研，成績一直優秀，其所著碩士學位論文《中法越南關係始末》，近二十餘萬字，被選刊於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論文叢刊。最終，邵循正、邵循恪兩兄弟於同年被清華選派出國，成就了一段學界佳話。獲得留學資格後的邵循正也應清華歷史系或者說 蔣廷黻的想法，前往巴黎，改攻蒙古史，最終成為了學界蒙古史的權威，也對清華大學歷史系及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做為事件最終解決關鍵，陳寅恪的表態倒是值得我們玩味。陳寅恪一向愛才，會為有才之人而不惜利用自己的影響，多方奔走舉薦。例如曾經是陳寅恪助手的于道泉曾在北海圖書館擔任滿蒙藏文書採訪編目工作，但是待遇不高，生活頗為窘迫。為此陳寅恪多次給傅斯年去信，希望能提高于道泉的待遇，幾經周折終得以實現。<sup>[24]</sup>此外，陳寅恪還曾經為老清華國學院的畢業生們進行過集體舉薦，包括了戴永祥、陳守寔、王庸、顏虛心、劉節、吳其昌以及謝國禎七位，<sup>[25]</sup>其中最感人的是他推薦戴家祥一事。戴家祥是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唯一的研究生，精治經學和古文字學。但是，作為冷門的專業人才，畢業即失業。因此，當陳寅恪得知這位國內稀有人才在上海“無所事事”時，心急如焚。於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三個月內就分別寫了三封信給容庚、傅斯年，希望他們能介紹這位人才到“廣州中山大學”或“燕京大學”任教，可惜未果。事隔四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舊事重提，希望戴家祥能到“適宜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擔任數點鐘功課。如中央大學有機會，則弟當致一保任負責之薦書與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處有機會，亦無不可”。可見其用心良苦以及對學生的關愛。

可是這次臨到自己的研究生，陳寅恪倒不積極了，甚至主動不推薦，這又是為何呢？他在給梅校長的信中說明不推薦的原因是其本人覺得朱延豐不合適。此前的畢業初試上，陳寅恪已經認為朱延豐“精深處尚少”，而對其畢業論文更是提出“此文資料疑尚未確，論斷或有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後，出以與世相見”<sup>[26]</sup>的意見，不甚滿意之情躍然可見。另外，就課業成績和論文得分而言，朱延豐都略低於邵循正，<sup>[27]</sup>而且，朱延豐的外語水準也不太能令陳寅恪放心。此次是選派法國，邵循正的畢業論文就是寫中法關係的，其英文和法文都很有基礎。這樣看來，邵循正的確是更合適的人選。

不過通觀整個事件，也有一點疑惑，就是陳寅恪給梅校長的信似乎出現的有點晚。從上文可知，歷史系作出推薦決定是在1933年11月9日，此後朱延豐兩次上書評議會及校長分別是在11月29日和12月16日，此間該事件在校內已是鬧得沸沸揚揚了。作為朱延豐導師及歷史系教授的陳寅恪對這一情況肯定是清楚的，此時陳寅恪只要在私下告訴朱延豐這是自己的決定和看法，就應該不會出現後面的風波。可是在此時段內我們並沒有看到陳寅恪的行動。直到1934年1月8日，事件早已溢出清華，引起了教育部及社會人士的注目，清華大學和蔣廷黻都面臨著巨大壓力時，陳寅恪的信才適時地出現。

為甚麼陳寅恪的表態來得如此晚呢？其中是否另有隱情？之所以說另有隱情，是因為有一個目前還未被學界關注的問題，即蔣廷黻主持清華歷史系時，作為歷史系學術上最權威和最具資歷的陳寅恪同主持系務的蔣廷黻，誰是歷史系的核心？或者說在發展清華歷史系，發展歷史系教研

取向上，陳蔣二人是否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呢？如果有不一致，那是否會影響到留學人選的選擇呢？

這個疑問可以通過考察本案中另一重要人物蔣廷黻來窺見端倪。蔣廷黻是羅家倫任清華校長後從南開大學請來建設清華歷史系的。蔣氏早年留學美國，曾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師從海斯教授，研究英國勞工黨外交政策，獲哲學博士後歸國，其專長是中國近代外交史。<sup>[28]</sup> 由於背景與學術興趣的關係，蔣廷黻的史學觀點和研究方法，與當時國內學界並不完全一致。他到清華後力圖按照自己的觀點改造歷史系。

到任以後，蔣廷黻首先解聘了當時公認的漢史權威楊樹達。因為蔣廷黻認為楊雖然精通漢書的版本和章句，但是他是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已經落伍，不能繼續下去。<sup>[29]</sup> 清華歷史系要發展，就要放棄這樣的舊學者，而需要利用清華研究院為清華乃至國家培養新的歷史教學與研究人才。<sup>[30]</sup> 他鼓勵優秀青年進入研究院深造，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希望這些新人在日後教授歷史時，能夠告訴學生中國從甚麼地方發源，又向何處發展，最後定居甚麼地方。在其回憶錄中，蔣廷黻說：“就我所知，1930年我們中國尚沒有日本、蘇俄、蒙古、西藏、泰國及越南歷史專家。一旦我發現一個青年，認為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歷史的話，我就說服他在研究院學習相關的語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績好，我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sup>[31]</sup>。

邵循正是學國際關係出身，具有研究中外關係的條件，而其碩士論文也正是關於中法越南關係的，屬於蔣廷黻所認為的中國學者忽略的問題。邵循正的英語和法語都不錯，完全符合蔣廷黻的要求。此後，邵循正也按照清華歷史系或是蔣廷黻的個人意見，專攻蒙古史。因此，選派邵循正留學正是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工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由此可見，邵循正的最終出國與蔣廷黻改造歷史系的構想有密切關係。實際上，蔣廷黻主持歷史系時，整個研究生培養都受到他這種思想的影響。當時史學部研究生可以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間選擇其一作為主修物件，<sup>[32]</sup> 從1933年到1936年一共有六人畢業，其論文題目如下<sup>[33]</sup>：

- 1933年 邵循正，論文“中法越南關係史末”
- 1933年 朱延豐，論文“突厥事蹟考”
- 1934年 王信忠，論文“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 1935年 張德昌，論文“清代鴉片戰爭前中西海舶貿易之研究”
- 1935年 馬奉琛，論文“八旗兵制考”
- 1936年 姚薇元，論文“北朝胡姓考”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到1936年，只有朱延豐與姚薇元兩人主修中古史，其他都是清史，而且完全側重中外關係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生中，主攻晚清以來中外關係的邵循正、王信忠、張德昌都先後被資送巴黎、東京及倫敦深造，學成後返校任教。很明顯，他們都是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計劃中的一份子。由此也讓我們多少感覺到，從事中國古代史以及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問題研究和教學的陳寅恪被冷落了。

由此推測，朱延豐案的背後大概還藏著些許玄機。推薦邵循正而不是朱延豐，這完全符合蔣廷黻改造清華歷史系的應有步驟。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延豐認為在推薦的事情上蔣有個人用心和目的是正確的，但是蔣廷黻個人用心的出發點在於對歷史教學的認識和對清華歷史系改造的構



想。對於這個想法，陳寅恪本人是完全贊同還是保留意見我們不得而知，在朱延豐出國問題上，陳寅恪的真實態度究竟如何也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總之，從朱延豐出國案上，我們發現在看似私人前程事件的背後暗定了朱、邵兩位名學者日後的研究方向與學術道路，隱藏了當年名噪全國的清華歷史系的悄然轉變與發展。這一轉變，也凸現了陳寅恪憂乎“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的史學觀與蔣廷黻強調史學研究之“時代性”和“科學化”<sup>[34]</sup>理念的異樣，為考察中國現代史學發展歷程提供了新視野。

【作者簡介】梁晨，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駐校研究生(2005年9月-2006年1月)。

- 
- [1] 何柄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70。
  - [2] 《清華同學錄》，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印行，1937年，頁260。
  - [3] 程巢父：《思想時代》，華夏出版社，2004年，頁5。
  - [4] 朱自清：《朱自清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09。
  - [5] 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臺灣）《傳記文學》，第七十卷，第四期。
  - [6]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30。
  - [7]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135-136。
  - [8] 參見1934年修訂以後的“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章程”第二條，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下），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65。
  - [9] 蘇雲峰：《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73。
  - [10] 根據1934年修訂以後的“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章程”第十二條，每年選派出國的研究生不得過十名，每部每年至多不得過二名。
  - [11]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2]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3]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4]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5]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6]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7]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8] 清華大學檔案：“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推薦畢業生出國研究和朱延豐案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來往文書（1933年3月-1936年8月）”。
  - [19]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50-151。
  - [20]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章程〉（1934年5月修正通過），《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頁565。
  - [21] 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23。
  - [22] 何柄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70。

- [23] 張寄謙：《素馨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89。
- [24] 李健明：〈逢人說項的陳寅恪〉，（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3月4日。
- [25] 陳寅恪：《陳寅恪集·書信集》，頁18。
- [26] 陳寅恪：《陳寅恪全集》下冊，〈突厥通考序〉，（臺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
- [27]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頁593-594。
- [28] 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頁16、17。
- [29]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24。
- [30] 何柄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69。
- [31]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頁130-131。
- [32] 何柄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69。
- [33] 《清華大學校史資料選編》，第二卷，頁593-594。
- [34] 蔡樂蘇：〈蔣廷黻與清華大學歷史學系課程新模式的建立〉，《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

## 【書評】

### 評何國華著《陶行知教育學》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甘穎軒

教育對於發達國家的人民來說是基本權利，人人生而有之；但是對於仍然處在政局不穩狀況的民國時期的貧苦大眾來說，就是一種恩賜。曾經留學美國伊利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的陶行知，跟隨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杜威學習，畢生貢獻於中國的平民教育，他的思想和貢獻向來都廣受學者重視，《陶行知教育學》一書作者何國華就是其中之一。

何著全書共分二十一章。第一章敘述陶行知的生平教育活動；第二至四章分別從宏觀角度論述其教育、哲學及生活教育理論；第五至十章主要針對陶氏的普及教育、幼兒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思想；第十一至二十章則微觀地探討他在教師修養、學校管理、道德教育、體育衛生、美育理論、勞動教育、科學思想、創造教育、人才教育及家庭教育各方面的主張；最後第二十一章討論陶氏對於當時新興的教育評估的觀點。

作者以不同的思想範疇劃分篇章，固然能夠相當細緻地討論陶行知的整套教育思想。書中大量引用《陶行知全集》及有關其言論著作的資料，充份顯示何氏花了相當大的心力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理念的整理上。然而，正如當代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環境與思想是相互影響的。<sup>[1]</sup>作者在討論陶行知教育思想之前，如果能夠先清晰交代當時的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情況與人文素質等影響思想發展的環境元素，將會大大增加討論的深度。當然，作者如果能夠改以時期作為劃分的方式，透過探索陶行知自1910年代至1940年代間的教育思想的轉變

過程，觀察「環境—個人歷練與實踐經驗—思想」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呈現其各項思想漲潮與退潮的情況，將會更為完美。

此外，作者提到陶行知在實踐個人教育理念的過程中，逐步發覺其師杜威所講「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中學做」的一套實用主義教育理論，並不適用於中國，於是就給它「翻了半個筋斗」。（頁4）作者在採納這個結論之前，似乎應該先詳細瞭解杜威的教育思想，再與陶行知的思想作相互比較。然而，從本書的徵引書目與內文所見，並沒有杜威的任何著述的蹤影。另外，作者提到陶行知在留美期間已相當重視學習福祿培與蒙台梭利等人的幼兒教育思想。（頁71）但是書中並沒有進一步探討陶行知的幼兒教育理念與上述兩人的思想的關係。作者在討論成人教育一章中，提到社會大學在辦學宗旨、教育方針、學制課程、學習方法等方面充份體現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頁97）但究竟是反映出那方面的思想，作者並沒有詳細交代和論述。

書中部份章節安排似也有欠理想之處，例如「政治思想的發展」（頁31-39）一節應該可以刪減，一來與書題無關，且作者多論述陶行知的政治態度與表現，真正屬於教育的部份並不多，而且政治也非陶行知的主要舞台。另外「提倡勤儉興學、重視經濟效益」（頁94-95）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力量」（頁95）兩節的討論內容其實與成人教育無關，應該放在普及教育一章內。而「多樣形式辦學」一節中所引用的《中國普及教育方案商討》（頁96），指的是普及教育的辦學形式，內容也與成人教育無關。如果作者要將兩者拉上關係，就要深入加以論證。還有，「改造社會，改造環境」（頁163-164）和「虛心求進，學而不厭」（頁164-165）兩節，前者屬於辦學者的終極目標與理想，後者則是個人修養的範疇，都不應該納入「學校管理」一章之內。

雖然如此，育才學校及曉莊師範學校是陶行知教育理論的主要實踐平台，作者頗能注意這點，並在論述過程中大量採用作為重要的證據，例如在「重視武術訓練」（頁198-199）、「上好體育課」（頁200）、「重視校址的環境美」（頁211-214）、「必須因材施教」（頁284）等章節充份反映出來。但是部份的章節，如討論教師修養一章中（頁137-150），就不曾提及陶氏如何從他所創辦的學校中實踐這方面的理念；另外在討論家校合作一節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現。（頁301-302）

以筆者淺見，陶行知研究還有相當大的探索空間，可供專家學者繼續努力。近代中國正值動盪歲月，沒有穩定的政府，更沒有穩定的教育政策。不少歸國學人正好填補這方面的缺口，他們利用個人的社會資本及其他資源，從不同途徑努力實踐他們各自的教育理想。陶行知作為其中一份子，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又是如何運用這些資本？除了陶行知本人辦學校外，他的學生也分別在全國各地辦學，反映陶行知的一套教育思想在當時是有一定程度的流播，究竟他的影響力達到那個程度？還有，與強勢且具敵意的國民政府的主流教育理念之間的角力情況等，這些都是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課題。

【作者簡介】甘穎軒，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

[1]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Unwin Paperbacks, 1984), p. 14.

## 【學界動向】

### 第四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紀要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的第四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主題是「近代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歷史回顧」，2005年6月17日及18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

開幕典禮由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持，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致歡迎辭；並邀請林治平教授（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外展部執行長）作主題演講，題目為「心靈與誠實——從生命教育的角度談基督教本色化的再思」。研討共分七組進行：

第一組「通論」，黃文江主持，李志剛、查時傑評論，包括：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五十年代中國教會對基督教本色化的評議」；段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兩點思考」；楊劍龍（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論近代中國家族觀念的嬗變與基督教文化」；吳梓明（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從教會大學的經驗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

第二組「人物研究」，湯紹源主持，楊慶球、郭鴻標評論，包括：蘇精（輔仁大學）「洪仁玕與倫敦會傳教士的交情」；李金強「近代華人教牧的誕生——王煜初牧師的生平及其思想」；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香港張祝齡牧師的本色化理念及實施」；何慶昌、賴品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離散中的本色神學：一個對謝扶雅的研究」。

第三組「教會事業與制度」，劉義章主持，段琦、林瑞祺評論，包括：林美玫（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郭斐蔚主教與美國聖公會在華教會事業的再造——以教會本色化的觀察與摸索為主的探討」；夏其龍（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胡振中致全球主教的兩封信」；姚西伊（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抗戰與唯愛：吳耀宗的思想掙扎（1931—1937）」；查時傑（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中華婦女祈禱會——台灣一個從事軍中傳教工作的組織」。

第四組「地區研究」（一），賴品超主持，邢福增、陳慎慶評論，包括：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學系）「何謂自立？從倫敦會華人教會的自立過程看」；湯紹源（建道神學院）「長洲教會的開發——一個鳥瞰」；湯泳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香港工業宣教之本土化過程——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為個案」；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會與社會：基督教靈實協會與香港將軍澳社區的形成」。

第五組「地區研究」（二），費樂仁（Lauren Pfister）主持，黃文江、費樂仁評論，包括：Thomas Reilly（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Languages, Pepperdine University）“The Son of Heaven, the Son of God: Taiping Views of Jesus the Christ”；Joseph Tse-Hei Lee（Department of History, Pace University）“Christianity and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aozhou, South China”；Cindy Yik-yi Chu（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Maryknoll Diaries: Hong Kong in the 1920s”; Wong Man K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otestant Churches in Hong Kong before 1941: A Spatial Perspective”.

第六組「教會大學、文化事業」，林美玫主持，姚西伊、吳梓明評論，包括：趙曉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美國學生海外志願傳教運動與中華基督教學生立志傳道團」；王立誠（復旦大學歷史系）「近代教會大學中國文化的滬江大學個案」；陳廣培（中國宣道神學院）「從『真光』雜誌看基督教對『女權』的態度」；林瑞祺（聖神研究中心）「納匝肋印書館與天主教傳播事工的本地化」。

第七組「文化研究」，王立誠主持，蘇精、楊劍龍評論，包括：莊欽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命自我作、福自己求』或『吉凶禍福由於天，非人所能自主』：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傳教士與道教、中國民間信仰之對話」；賀璋瑢（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禮記》的性別意識探略——兼與《聖經·創世紀》的性別意識的比較」；馮羽（南京曉莊學院人文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以林語堂《信仰之旅》為中心」。

研討會舉行期間，並有王爾敏教授贈書儀式及本色化著作展覽；最後由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報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會的成立、工作、展望」，由梁家麟（建道神學院）報告「王爾敏教授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貢獻」。

---

## 【學界動向】

### 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匯報 (2005年下半年)

#### ● 孫中山研究講座系列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辦「孫中山研究講座系列」之三於2005年10月4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邀請香港大學歷史系陳福霖教授講「孫中山與廖仲愷」。

#### ● 中國基督教史講座

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委員會、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05年11月26日合辦基督教史講座，邀請宮哲兵教授（武漢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所長、宗教學教授）主講，題目為「從田野調查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 ● 中國近代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的「中國近代史講座」於2005年11月23日舉行，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林啟彥教授主



持，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台灣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鵬教授主講，題目為「抗戰勝利60周年和台灣光復60周年想到的幾個問題」。

## 6 孫中山學術研討會紀要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辦的「孫中山學術研討會——兩岸三地學者的論述」，2005年12月16日至17日在香港浸會大學邵逸夫大樓會議廳舉行。開幕典禮由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致辭，研討內容包括總論、史料與研究、分論三部分：

第一節「總論」由胡春惠（珠海學院）主持，包括：潘漢唐（有漢企業集團有限公司）「關於孫中山」；張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國同盟會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林家有（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二節「史料與研究」由李谷城（珠海學院）主持，包括：黃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孫文全集》編輯」；李金強「孫中山研究之史料——以香港時期孫中山及其師友為例」；趙立彬（中山大學歷史系）「革命話語與家國觀念——孫中山撰寫的兩篇《族譜》序言述論」；文兆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之孫中山研究」。

第三節「分論」（一）由劉蜀永（嶺南大學歷史系訪問學人）主持，包括：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孫中山與胡漢民」；林啟彥（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宮崎滔天與近代中國的革命」；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偉人·世界·鄉土——論孫中山的廣州地域文化情結」。

第四節「分論」（二）由李培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持，包括：丁新豹「一個博物館的誕生——甘棠第的保護與修繕」；敖光旭（中山大學歷史系）「失衡的外交——孫中山、國民黨與中俄交涉」；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的視覺形象——歷史與藝術之間」。最後由周佳榮教授致閉幕辭。

研討會舉行期間，有兩項加插節目：其一是《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悉於此時出版，在會場舉行新書發佈會，由該書的三位主編林啟彥、李金強、鮑紹霖（香港樹仁學院）主持；其二是參觀正在裝修的孫中山紀念館（預定2006年底啟用）及孫中山史蹟徑，並於中環陸羽茶室（當年革命黨人所辦的機關報《中國日報》社址所在）午膳。